

「九一一」沒有改變世界

邱震海博士 鳳凰衛視評論員

「『九一一』改變了美國」、「『九一一』是美國衰落的開始」、「『九一一』改變了世界政治版圖」，這是「九一一」十年來人們聽到的較多的評論。但我認為，這一切某種程度上都是過於簡單化的解讀，也陷入了某種迷思。最重要的是，由於這種誤讀和迷思，人們對「九一一」產生的深刻根源，以及人類社會存在的一些根本問題反倒容易忽視了。

世紀風暴

「九一一」沒有改變美國

之所以說「九一一」沒有改變美國，乃基於幾個理由：一、美國沒有對「九一一」的深刻根源進行反思；二、美國過去十年的反恐策略，大都基於對「九一一」成因的圖像化解讀，有的（比如伊拉克戰爭）則根本就是以反恐名義實現美國更為深層的戰略利益；三、美國的知識精英對「九一一」以及「九一一」之後美國發動的反恐戰爭，沒有產生如對越南那樣的深刻反思。

過去十年人們看到的，只是「九一一」美國在反恐安全措施上的收緊，看到的只是美國通過反恐而對某些地緣格局的改變，看到的只是「九一一」對美國國民內心世界的某些改變。但美國國民和精英階層過去十年顯然陷入了一個更大的困惑或迷思，即認為只要反恐就能改變一切，捍衛美國本土的安全成為美利堅合眾國至高無上的目標。

然而，「九一一」的成因到底是什麼？美國的人們顯然沒有，或者也不願意有更多的反思和觸及。即便對於一般認為的恐怖主義根源——文明衝突，美國過去十年也沒有着手通過文明對話予以解決。因此，在美國以反恐名義發動的兩場戰爭上，尤其是在事前已有巨大爭議，事後也被證明為巨大荒唐的伊拉克戰爭上，美國的知識精英完全沒有表現出當年對越戰那樣的強烈的反思和批判精神；美國知識精英在這一問題上，顯然遠遠落在了他們歐洲同行的後面。

而知識精英一旦在某個問題上喪失了其與生俱來的批判精神，那麼在成因上無疑折射了某個巨大的盲點，而在後果上則會導致全體民眾和國家機器向着更為茫然的方向滑行。

這個盲點就是：「九一一」之前，由美國主導的西方經濟和政治秩序激起了伊斯蘭人們的不滿和反彈，並導致了其中個別極端分子和團體的激進恐怖行動；但美國的地位以及美國本土從未遭襲的歷史，使得美國的精英階層由於本土遭襲給美利堅民族帶來的心理創傷，而繼續忽略了對前者的關注。

由於這一盲點的存在，過去十年的美國表面上似乎改變了很多，但在精神實質上卻沒有任何改變，甚至沒有任何的觸動。

「九一一」沒有改變世界

與此同時，「九一一」也沒有對世界秩序的深層結構有所改變。且不說「九一一」是否就是美國衰落的開始，也不說美國是否已開始衰落，可以肯定的是，沒有「九一一」，美國和世界經濟中的深層問題將會照樣存在。這些問題從微觀層面上，有美國和世界經濟中的技術性問題（如就業、經濟增長、稅收等），從宏觀層面上則主要涉及全球經濟、政治和文明秩序的失衡，並由此而導致相當部分弱勢群體以極端的方式展現反彈。

與此同時，認為「九一一」改變了中美關係，在相當程度上也是一個誤讀和迷思。十年前小布什上任伊始將中國界定為「戰略競爭對手」，爾後的中美軍機相撞似乎加劇了這一態勢；從這個意義上說，「九一一」轉移了美國戰略重點，給了中美關係以某種「喘息」的機會。但這是中美大格局的一個很小的側面。中國融入其中的全球化進程、中國實力的厚積薄發、中國經濟不斷增大的總量，都使得中美關係具有遠遠超越「九一一」這一偶然因素的更為深刻的大邏輯。可以肯定的是，即便沒有「九一一」後的美國戰略重點轉移，中國崛起的進程照樣會展開，美國屆時照樣會被迫回歸理性層面，與中國展開務實的互動。

既然上面這個大前提成立，亦即中國崛起並不依賴於「九一一」這個偶然因素，那麼可以得出的另一個邏輯結論就是：過去十年中美的日益緊密化與日益複雜化，可以說與「九一一」完全沒有關聯，而主要是建基於中美兩個大國基本態勢所發生的微妙而深刻的變化。因此，未來幾十年，除非發生十分重大的諸如改變國家體制並進而影響國家實力走向的事件，中美關係的發展也不會由於某個偶然性因素而呈現重大拐點。

探究全球治理結構深層

由於與「九一一」有關的種種迷思，十年來，包括美國、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的人們，實際上忽略了「九一一」產生的深刻根源。

從表面上看，「九一一」起源於一部分伊斯蘭極端分子對美國主導的西方經濟、政治乃至文明秩序的反彈。正是由於這一原因，過去十年的主流解讀認為，文明對話是解決文明衝突的主要手段。但正如一位著名學者所說，文明本身不會產生衝突，文明之間的不平等才會引發衝突。既然這樣，下一個合乎邏輯的問題就是：文明之間的不平等又來自何方？如果說文明的不平等首先來自世界經濟秩序的不平等，那麼這一全球性問題所導致的後果，就必然不僅僅是文明的不平等和文明之間的對立，而同時也會引發全球層面的其他一系列深層問題。

中國著名國際關係學者王緝思日前出席鳳凰衛視《震海聽風錄》節目時認為，在「九一一」與倫敦騷亂、挪威恐怖事件、「阿拉伯之春」，甚至與印度、中國等國的國內社會問題之間，存在着一些內在的邏輯聯繫，那就是全球治理結構中出現了一些深層的問題；城市化進程帶來的問題、資源短缺、老齡化、經濟秩序失衡等，都已成為全人類面臨的共同問題，這些問題會引發個別人士和集團的極端抗爭行動，但人們的注意力卻不能為這些個別的極端行為所左右，而應該放在全球治理結構的深層。

跨越國家與文明衝突

王緝思的思考將對「九一一」成因的探究推向了一個新的更深入的層面。換言之，個別極端分子和小集團的破壞或抗爭、文明的衝突其實都是表象，甚至只是表象的一部分，其更深刻的原因應當從全球治理的深層結構中去尋找。如果這樣，人們就不會一葉障目，在關注美國本土安全和美國國民心理傷害的同時，也將更多關注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並從解決共同問題的高度出發，回歸審視各自國內面臨的問題。

從中美關係來說，這一關係一方面難以完全擺脫大國紛爭的格局，但另一方面則又必須擺脫這一格局。對全球治理結構深層問題的關注，必須跨越國家關係和文明關係的層面。從這個意義上說，「九一一」十周年反思，給中美兩國的精英階層提供了一個確立共識的契機。

CEPA循序漸進 助港拓內地市場

蘇錦樑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八月中訪港期間，宣布了一系列支持香港社會和經濟發展的措施。當中，中央政府明確表示會進一步向香港開放內地市場，並爭取到「十二五」末，通過CEPA，基本實現內地和香港服務貿易的自由化。

特區政府對此表示歡迎，CEPA進一步的擴大開放，讓香港傳統和新興服務業，更好地把握國家要提升服務業的策略目標。

CEPA涵蓋三大範疇：分別為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及貿易投資便利化。自2004年實施至今，CEPA帶來不少經濟效益。貨物貿易方面，逾1,600種的香港原產地貨品可享零關稅優惠進口內地。截至2011年8月31日，已享零關稅優惠進口內地的貨物總值超過345億元港幣，關稅優惠約24.1億元人民幣。

服務貿易方面，CEPA涵蓋的服務貿易開放領域由最初的18個增至現時的44個，設於香港的服務企業由於CEPA從涉及內地業務而獲得的業務收益，從2004年的16億元港幣增加至2009年的147億元港幣，期間累計的業務收益高達616億元港幣。2007至2009年期間，香港服務提供者藉CEPA在內地設立的企業，獲得累計約1,985億元港幣的業務收益。同期，設於香港的服務企業由於CEPA亦獲得約551億元港幣的額外業務收益。

實現兩地服務貿易自由化

CEPA是一項開放及不斷發展的自由貿易協議，透過循序漸進的方式，為加入更多開放市場的措施設下機制。在多個服務領域如醫療、建築和法律服務等，內地給予香港服務提供者的市場准入條件，比在世界貿易組織對其他外國投資者所作出的承諾更為開放。CEPA是內地至今所簽訂最優惠的自由貿易協議。

醫療服務方面，CEPA及其補充協議的開放措施讓香港的醫療服務得以在內地拓展業務，有關措施允許香港服務提供者以獨立、合資或合作形式設立門診部和醫院。此外，符合資格的香港醫生可通過認定方式在內地執業。截至2011年7月，共有10名專科醫生透過認定方式獲取內地的《醫師資格證書》，而廣東省衛生廳亦已批出

10張《設置醫療機構批准書》予香港服務提供者在廣東省設置門診部。

在過去數年，特區政府一直聯同內地衛生部門舉辦多場研討會，向香港醫療業界講解CEPA的相關措施，並就業界到內地設置門診部和其他醫療機構提供申請程序指引。研討會深受業界歡迎，並會繼續舉辦。

建築服務方面，根據2010年簽署的《CEPA補充協議七》，通過互認取得內地相關資格的香港建築師和結構工程師，可在廣東註冊執業，不受在香港註冊執業與否的限制。

廣東相關部門在本年初公布香港建築師和結構工程師的註冊安排，當中要求申請人士須通過相關的內地專業資格考試，以及受聘於在廣東具有相關資歷的機構。首場專業資格考試訂於本年9月舉行，香港建築師普遍反應良好。

律師方面，CEPA的開放措施以循序漸進方式實施。在CEPA下，香港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獲准參加國家司法考試。自2005年起，香港居民更可以在港應試。取得內地律師資格人士可以從事非訴訟法律事務。根據《CEPA補充協議三》，取得內地律師資格的香港居民，亦可從事涉港婚姻、繼承案件的代理活動。

由於香港與內地的規管制度不同，香港企業利用CEPA優惠待遇在內地申請開業、註冊執業或經營業務，須遵守內地的法律法規。由於兩地制度的差異，部分專業服務界別進入內地市場時，對各種行政程序和要求或會感到繁複。

特區政府一直與內地部門保持密切聯繫，跟進本地業界利用CEPA措施進軍內地服務業所遇到的問題。我們亦會繼續致力推廣CEPA，令服務業界更了解CEPA的措施和落實配套安排，以及內地現行的法律法規。同時，業界亦可利用香港貿易發展局提供的中國商務顧問服務，取得關於內地法律法規以及申請要求的資訊。

特區政府已經與內地相關部門展開磋商，預期在本年底簽署《CEPA補充協議八》。我們會繼續為香港企業進入內地市場爭取更佳的市場准入條件，以提供更多的商機。

港台工會憑什麼這樣囂張？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正是由於反對派的包庇，加上編輯自主的保護傘，令港台工會愈發有恃無恐，愈發肆意妄為，不但要控制港台節目方針，甚至要干預政府的人事權，要自行決定廣播處長人選。如果工會可自行任命處長，港台勢將變成名副其實的「獨立王國」，變成由公帑營運的反政府宣傳工具，這正是港台工會可以如此囂張的原因。難怪多年來港台的積弊難以根除，根源正在於港台工會。

懸空逾半年的廣播處處長職位，人選終於揭盅。公務員事務局日前宣布，委任現任勞工及福利局副秘書長鄧忍光出任。由於人選並非是港台工會「欽點」的人選，令工會大為惱火，立即發表聲明，聳人聽聞的形容是「黑暗的一天」，批評政府委任沒有廣播經驗的政務官出任處長，做法粗暴干預港台的編輯自主，更未打先判指候任處長是紙上談兵，彷彿工會「欽點」的人選才是老將知兵。廣播處長人選是否最佳選擇當然可以討論，但港台工會有必要一開始就擺出一副戰鬥姿態，對新老閣施以下馬威嗎？港台工會憑什麼這樣囂張？

港台積弊深重 必須撥亂反正

廣播處處長由既熟悉傳媒運作，又長於管理者出任，固然是最為理想。但在目前政治化的環境下，有能力有經驗者是否願意出任卻令人疑問。如果從熟悉業務與精於管理者二選其一，還是長於管理的政務官更勝一籌。首先，港台目前最大問題是管理混亂，監管鬆懈，貪瀆案件屢見不鮮，而非節目質素不善，與其找個識做節目的人，不如找個懂管理的人來撥亂反正更加重要。同時，港台以往的積弊已說明，單靠其內容改善根本難寄厚望，如果聽工會指示提升原來的管理層出任，還如何期望會有新人事新作风？最終只會讓港台繼續自己管自己，這肯定並非社會所期望。最重要的是，港台由公帑出資營運，是公營機構，派政務官出任處長有何問題？樹仁大學新聞系系主任梁天偉也表示，相信政務官能勝任處長一職，「曾蔭權都係由政務官出身，佢都可以做特首，點解鄧忍光唔可以出任。」港台工會有什麼好質疑？

港台工會說由政務官出任是「黑暗的一天」，原因是沒有委任有廣播經驗的政務官，這是笑話也是廢話。除了港台現任管理層之外，其他的政務官自然不會有廣播經驗，但現任管理層過去一直對港台問題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又或是力不從心改革無從，不論哪個原因都說明由港台管理層出任新處長只會令有關問題延續下去。即使由政務官出任，相信一般節目上的

對政治暴力絕不能姑息養奸

文滿林

政治流氓及憤青不斷侵犯立法會議事大堂及社會秩序，法官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對一些蓄意違法者應判不判，或者是輕判了事，無形就是一種懲戒。若然法官依法量刑判刑，肯定能夠起到阻嚇作用，不致令到流氓憤青違法事件越演越烈。

例如早段時間，那些政治流氓在立法會會場上擲物、放紙飛機、擲蕉等行為，就應向他們控以亂拋垃圾之罪，每擲一次就判罰違法者一千五百元。遺憾的是，執法和法官大人沒有這樣做。

一些人行街時不經意在褲袋取東西時掉下一些紙張，遇上食環署人員就遭檢控，要按時上法庭及遭到定額罰款一千五百元。相比之下，那些在立法會會場刻意擲垃圾的政治流氓更應受到檢控和罰款才是。否則，就對不經意掉下紙碎、煙頭而遭檢控罰款的市民不公平、不公道，還說甚麼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呢？最近一次科學館論壇事件的發生，更讓社會各界譁

然，強烈要求當局執法人員拘捕這些流氓憤青，強烈要求那些法官大人依法嚴懲判刑。要拘捕這些犯事者不難，會場設有閉路電視，新聞片段也當時直播出街，全港市民都看個清楚，人證物證俱在。

暴力破壞公眾諮詢論壇一事是一起嚴重的刑事毀壞事件，以鐵筆撬開演講廳大門，用暴力又住保安人員頸部，踏上枱面掃場，毀壞花盆等等，每一項都是刑毀，每一項都足以構成嚴重刑事案件，判以重刑。現在要看的是當局的決心，看執法部門的執法能力，更要看法官大人的取態和判刑量刑。一些普通的刑毀個案一經檢控成罪都會判監，今次論壇暴力刑毀事件更不能例外或輕輕帶過，尤其對那些戴上面具犯事者更應嚴懲判刑。當下全社會的焦點都落在法官身上，若執法人員將違法者送上法庭，而那些法官對之輕判的話，將會引發嚴重後果。

九月一日是全港八十萬學生開學的大日子。兩個月暑假後，學生們都精神奕奕接受新一年的挑戰。但是部分居住深圳等地的幼稚園和小學初年級的跨境學生，卻因申請不到禁區通行證，未能取道羅湖道乘坐保母車上學，需要在家長陪同下或自行乘搭地鐵，以較曲折的方法回校。這可能對學生的安全構成威脅，亦增加了家長的交通費用負擔。

教育局解釋，羅湖道屬鄉郊道路，也是羅湖管制站的唯一緊急車輛通道，交通流量已嚴重超出負荷。政府為了保障學童的安全，所以不能增加簽發學童禁區通行證。

的確，羅湖道本身的設計並不是為了應付跨境學童，但是政府必須了解學童跨境上學不是一個短暫現象。根據立法會文件，2009至2010學年，新界各區學校有超過8000名跨境學童，較去年增加了19%。

由於通關手續日趨方便，深圳的生活指數較低等因素，越來越多香港居民選擇在深圳居住。根據規劃署與深圳市統計處進行的調查顯示，2008年，共有61900名香港人（40700個住戶）居住在深圳。這些住戶的家長受到學券吸引，並大多希望子女繼續接受香港教育。

另外，自從「莊豐源案」和自由行政策推出後，越來越多內地居民來港產子，這些嬰兒全都是香港永久性居民，可以選擇在港接受教育。由於香港教學質素有一定聲譽，所以這些嬰兒長大後很大機會來港求學。

教育市場亦積極回應需求，例如有團體即將在深圳舉辦跨境學童香港教育展，以方便居民尋找合適的香港學校。從以上角度看，跨境學童對禁區通行證的需求只會不斷上升。無論政府如何勸喻家長安排子女「就近入學」，也難以起到重要作用。

因此，政府應有的做法不是設立上限，而是考慮其他方法，解決有關問題。短期而言，若然政府仍然限制每日使用羅湖道的保母車數量，則應統計這些保母車尚有多少空位。就着有關數字，政府可向申請不到禁區通行證的幼學童補發，並與保母車公司協商，分配有關學童。長遠而言，政府需要修繕羅湖道、擴建管制站、開設更多過關通道等，以滿足社會需要。

跨境學童申請不到禁區通行證的問題，只是香港與內地的人流、物流、資金流等進一步加強所產生的現象之一。其他如內地孕婦來港產子、內地人來港購物等，政府都需要正視。事實上，這些現象未必一定是壞事，例如跨境學童可以紓緩新界「殺校」等問題；內地孕婦來港產子可能減輕人口老化問題；內地人來港購物可以增加更多就業機會等。只要政府做好長遠規劃，絕對可以將此變為機遇。

正視跨境學童上學難問題

陳振聲